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龚维斌

(根据录音整理, 未经本人审阅)

作者简介: 龚维斌, 男, 1965年6月出生, 安徽长丰县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 现任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主任、教授、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 中国统战理论研究会常务理事, 中国人口学会党政干部教育分会理事, 西南政法大学兼职教授, 先后在美国锡拉丘兹大学马克斯威尔学院和英国约克大学担任访问学者。

主要研究方向为“三农”问题、社会阶层与社会发展问题以及公共危机管理。授课专题包括了当代中国阶层结构变迁研究、小城镇建设与中国现代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中国现代化、“三农”问题研究、妥善处理各种利益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突发事件处置与公共危机管理、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协调阶层关系, 保持社会稳定、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现代公务员培训方法。

参与过多项国家重点和重大社会科学课题研究, 主持完成省部级课题2项, 出版著作多部, 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社会学研究》、《国家行政学院学报》、《中国行政管理》、《人民日报》等报刊杂志上发表论文近百篇, 多篇论文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和《新华文摘》全文或部分转载、摘登。同时还出版过个人专著、合著、译著多部。

为什么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这几年党和政府非常重视的一个问题，各级政府进行着社会管理探索和创新。我主要谈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二是如何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从理论和实践结合层面，把这些问题进行一些说明，为了说清楚这两个问题，我准备讲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社会风险不断加大；第二，社会管理能力不强（那么这两个方面的内容主要回答为什么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第三，以社会建设推进社会管理；第四，在统筹兼顾中推进社会管理（实际上后面两个方面的内容主要回答怎么样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一、社会风险不断加大

大家知道，改革开放中国 30 多年走出了一条非常成功的现代化建设之路，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尤其是在经济方面，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和改善。但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也会经常遇到一些被动和困境，一个是经济成就越来越大，社会问题也越来越大；第二个被动，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群众不满意的地方，不计其数。为什么会这样出现这样一个困境？我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 30 多年，如果前十几年和后十几年对比来看的话，中国社会

实际上发生一些深刻的变化，这个变化我把它概括为五个转变。

第一个转变是：资源配置从扩散向重新聚集转变。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社会实行高度的计划经济，在计划经济时期，财富和资源掌握在国家手里，老百姓手里的财富和资源比较少，在这样一种体制下，我们实行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分配方式，结果是人们劳动积极性不高，生产力不发展，平均贫穷。因此，上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中国进行了一场自下而上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向城市扩展，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发展乡镇工业，发展商品经济，这一系列改革措施，极大的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和工作热情。生产发展了，很快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人民的一大难题，使亿万农民摆脱了贫困，解决了温饱，甚至过上了小康生活。而农村改革第一步取得巨大的成功。这个经验，很快进入了城市，城市向农村学习，80 年代初的时候有一句话：包子进城一包就灵。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以后重新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向农村学习，搞承包租赁。大家回想一下，30 年前，我们城市的改革、企业的改革和承包租赁，在分配上工资加奖金，奖金突显；在工资分配方面，实行计时

工资、计件工资,打破了大锅饭的格局。这些措施极大的调动了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和工作热情。生产力发展了,他们的工资水平生活待遇改善了。那么例举这一些事实,无论是农民也好,工人也好,在第一轮的改革里面,大家都分享了改革的好处,蛋糕做大了,他们吃上了蛋糕,所有我们把改革前十几年,这种状况描述为改革的储备期,大家普遍地都受益,但是这个储备阶段,90年代中期发生了变化。变化带来的后果和结果是城乡之间、地域之间、不同的群体之间、收入的差距、发展的差距重新拉大。最大问题是城乡的相对差距。1978年-2011年,30多年的时间里,大家如果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作一个曲线图,你可以发现,从92年、93年以后,城乡收入差距迅速扩大,而且呈继续扩大的趋势,呈一个剪刀的形状,尽管去年和前年城乡收入差距有所缩小,但是仍然维持在3倍以上。严格地说,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不止3倍。因为我们现在用这两个数,一个叫农民人均纯收入,一个叫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这两个数不是完全具备可比性。因为他们的内涵,他们的外延是不一样的,农民纯收入是现金混合的概念。比如说,农民去年是6000多元钱,并不是每个农民都能拿到这6000元的现金,有很多是实物、粮食、蔬菜、鸡蛋折算出来的收入。那么,考虑到城镇居民享受到的一些国家各种福利的补贴和其他因素,城乡的收入差距应该在4倍到5倍之间。那么,去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按照惯例发表一个社会形势分析蓝皮书,在这个蓝皮书里面,专家们用了一些形象的词来描述了当前农村地区发展出现的一些困境,叫“四大皆空”:一是农村的产业空了;二是农村的年轻人空了;三是农村的住房空了,我想这不需要多解释,值得人们关注的是农村的干部空了。所谓农村干部空了是

两层意思,是讲农村的很多乡村干部变成了走读干部,他们不和农民住在一起,在城镇居家,早上到农村上班,晚上回城里生活。那么还有一层意思是农村的治理人才匮乏。我去年多次去重庆调研,先后去了4次,大概加起来有20多天,跑了很多地方调研,跟各级领导干部有接触,包括最高领导也有接触。那么,当时他们市委组织部、人大主任陈存根同志跟我们讲,你们在北京经常说,乡村干部现在文凭越来越高,作报告、写文章的能力越来越强,实际这个判断在重庆不太成立。因为乡村的干部,乡村非常优秀的人才,考大学不回来,还有一些优秀的人才外出务工、经商、办企业也不回来。农村要找一个合格的、优秀的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所以说了,什么叫农村干部空了,这也是一个方面。当然,我们说农村发展困境还有其他原因,“四大皆空”只是一个表象。那么,第二个差距就是地区之间的差距。实际这几年,我们西部边境十几个省市,我们每一个都去过,而且有些地方去过多次,有很多感受。尽管自己跟自己比,这些地方都在往前走,但是,实际上有很多地方,如果跟沿海发达地方相比的话,这个差距是相当大的。这是我讲的第一个大的转变,就是财富和资源在改革的前十几年和后十几年,可以说配置方式发生了变化,如果说改革的第一个阶段,改革的前10年,是改革的普惠期,那么近十几年,应该说就是财富和资源的分配的重新聚集期,或用一个比较中性的词来描述,改革进入了一个新一轮的利益调整期。也因为这样,前后两个十几年,财富分配方式和资源分配方式发生了变化,所以人们对改革本身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人对改革是高度赞成,高度支持。尽管改革开放初期,特别在农村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田

单干包产到户,少数农民不理解,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但是,生产力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很快打消了这些人的疑虑,转而坚定支持改革开放。但是到了新世纪,我们注意到,由于出现了收入差距扩大,腐败现象滋生,甚至是蔓延,所以对改革产生了一些疑问,2001年这种疑问,这种质疑的思潮达到了顶点。

如2001年春天北京一些经济学家,有些甚至是非常有名的经济学家,在西山开了一个西山会议,最后形成了一本万言书上书中央,要求中央查一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院,领导权是不是掌握在马克思主义的手里,出现了两级分化,出现了全盘资本主义,改革到底是搞好的还是搞坏的。所以,有些人就讲改革这几年,共识发生了分歧。也因为这样一个社会思潮,所以这几年来,总书记、总理、中央领导不断的强调,要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不能动摇,不能后退。所以2008年总书记第一次提出了,大家都熟悉的一个著名的论断,叫“三不”,第一是不动摇,第二是不懈怠,第三是不折腾。最近不断强调的话,那么强调这个观点,它背后实际上是一些深刻的社会思想基础。这是我讲的第一个观点。

第二个,中国社会的30年,我们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原来的简单向复杂化方向转变。

社会结构里面最核心的是阶级阶层结构。1978年以前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比较简单,当时,号称叫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两个阶级、一个阶层表明是什么,表明中国社会分化不大、差异不大,讲农民,一闭上眼睛,你就可以

想一个标准农民形象在你脑子里出现。什么是农民,头戴草帽,腰系麻绳,进到城里喝瓶汽水不知退瓶,那就是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就是农民。但是,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的农民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些社会学家们认为,中国的农民阶级可以划分为九个阶层,包括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乡镇企业管理者、乡镇企业工人、农民工、乡镇企业管理人员、乡村干部、乡村知识分子,还有纯农民以及乡村里没有职业九个阶层。那么这些说明什么,说明我们中国的农民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实际上我要讲一个观点,我们农民在我们中国变成了一个特殊的历史现象。为什么说特殊,因为,农民按照道理来讲,他是一种职业。做工的叫做工人,打渔的叫渔民,教书的叫教师,务农的叫农民。但是,你比如在清华大学,在城市里面,盖房子的、修路的、搞花草的这些人,从农村来的,你问他:“你是农民,还是工人?”十有八九他们会认为自己是农民,为什么会认为自己是农民,因为他们的户口是农村户口,所以农民在中国变成了一种身份,而不是职业。他农民觉得是农民工,而不是纯粹的工人,所以农民变成了一种身份,而不是一种职业。所以我说,外国人问你:中国现在有多少农民?我们一般答不上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数,至少有三种数讲农民。第一种是讲户口,中国现在大概还有68%户籍人口还是农村户口。我们13.4亿人,如果按70%算的话,9亿是农民,这是第一个数据。第二种是说城市化率,大家知道,我们去年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已突破50%,达到了51.27%,又一个还有48.7%的人生活在农村,这样算来,我们13.4亿人其中一半还有65000万人是生活在农村。所以有6亿5千万是农民是第二个数。第三个数讲职业,我们13.4亿人有8亿是劳

动力, 8 亿人中有 38% 的人是就业在第一产业, 务农农民现在种地的下降到 40% 以下, 我们按大数 40%, 3 亿农民。6 亿 5, 9 亿, 所以农民这个就是 3 倍, 这个数表明什么, 表明农民阶层、阶级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那么到底中国 13 亿多人到底可以划分为多少个阶层, 10 多年前, 我们做了一个研究。我是社会科学院毕业的, 跟着我的博士生导师, 从 1998 年开始, 就在全中国做这个社会阶层的研究, 我们做了很多调查, 访问了 1000 多人, 做 10000 多份问卷。后来 2001 年的时候, 我们发表了一份报告, 叫《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 在这份报告里面, 我们提出了当代中国社会可以划分为十大阶层, (1) 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拥有组织资源); (2) 经理人员阶层(拥有文化资源或组织资源); (3) 私营企业主阶层(拥有经济资源); (4) 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拥有文化资源); (5) 办事人员阶层(拥有少量文化资源或组织资源); (6) 个体工商户阶层(拥有少量经济资源); (7) 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拥有很少量的三种资源); (8) 产业工人阶层(拥有很少量的三种资源); (9) 农业劳动者阶层(拥有很少量的三种资源); (10) 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阶层(基本没有三种资源)。这个观点在十多年前, 具有非常大的影响。

这里面呢, 我给大家解释几个事情, 第一, 我们这里用的两个概念是在混淆的使用, 一个是阶级, 一个是阶层。严格地讲, 阶级和阶层是有区别的, 但是, 我们在研究里面, 不仅没有区别, 而且有意地模糊他们的界限。因为过去 1978 年以前, 我们不恰当地讲阶级、阶级斗争, 伤害了很多人的感情。所以在新的历史时期, 中国共产党果断地废除阶级斗争为纲, 把工作重点放在经济建设中来, 不再愿意重提阶级, 但是,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

不讲阶级, 不等于这个问题不存在, 社会客观上它分成不同的阶级阶层的。作为我们执政者, 作为领导干部, 党和政府, 我们要制定公共政策, 要协调各方利益, 首先要考虑的是阶级、阶层的分布状况, 所以必须要研究这个问题。所以到了 80 年代中后期, 中央领导也开始关注这个问题, 说: 只是学者们要研究一下阶级阶层。到 1998 年, 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对这方面作一个系统研究。那么, 当时我们也意识到, 继续要用阶级的观点, 这个方法、这个词可能会在调研里面遇到障碍。所以用了一个比较中性的叫阶层, 尽管如此, 我们科研组成立之初第一次到辽宁海城去调研, 还是遇到了障碍。私营企业听说我们要研究阶层, 他马上非常敏感地问: 你研究的这课题什么意思啊? 是不是哪一天要划成分, 把我们的财产收回去呀, 要定一个资本家。所以后来我们意识到这个阶层, 也比较敏感, 对我们用更大的概念叫社会结构, 大家注意, 社会结构由简单化向复杂化转变, 社会的核心是阶层。第二, 我们这个阶级阶层结构, 是怎么划分出来的。1949 年, 刚刚解放的时候, 每一个人, 你们在座的各位, 包括我, 我们家里面的出身, 家庭成分, 那个出身、家庭成分就是阶级阶层定位。当时, 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 叫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 区分了人们阶层的位置高低。那么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它是一种经济活动, 土改的时候, 你家里面有没有土地, 有没有务工, 就可以划分贫农、富农、中农、下中农、下农等, 后来在我们的研究里我们发现, 简单的以生产资料占有方式, 不能准确区分人们社会学上的高低, 于是, 我们根据社会学上的方法, 按照西方比较发达国家的分类方法, 阶层划分的方法, 提出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分层的标准, 叫职业分配为基础, 参考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量。什么叫

组织资源,在座的各位,您是领导干部,手中握有的权力,就是组织资源。用一个比较学术的语言来讲,就是在党政机关中,您在这个位置带来的人才调控的能力,就是组织资源。你比如当市委书记,那肯定有很多组织资源,调配资源的能力。这组织资源不一定是让人搞腐败,但是客观地可以提高你的社会地位,能保持你的社会地位的优势。后来我在调研里面发现,不仅仅是因为职位带来权利,带来对人财物调控能力,拥有丰富的组织资源,其实我们有好的职业,也能够带来组织资源,影响人们的社会地位。

举个例子,2007年,十七大召开以后,我带队到浙江去调研,从省里面下去到一个世界闻名的小商品之都去调研,你们说什么地方?义乌。省委组织部一个干教处的处长陪着我,义乌市委组织部派车拉着我们去调研,参观两个企业,两个非常大的、非常有名的企业,一个叫梦娜,一个叫浪沙。生产什么?生产袜子。那么我在车上,组织部的同志跟我热情地介绍,我们义乌人有钱,有钱人多,千万富翁比比皆是,但是义乌人有个特点就是,他们勤劳、低调、不张扬,你看马路上蹲三轮、拉货的,没准一个不是千万富翁。我不太相信,他看我不太相信说你看我们开车的张师傅就是千万富翁。我座在后,就问他,我说:“您是千万富翁吗?”他回头憨笑说:“差不多吧!”我说:“你怎么这么有钱啊?”他老婆在家开工厂,生产小商品,雇二三百人,差不多,二三百人的老板娘的先生可不是千万富翁吗?后来我又问了一句话:“我再问一个问题,你别不高兴啊”。“那你说吧”。“我说你夫人当老板,千万富翁,那你开车也估计也收入不高,你在家里面是不是地位不高,有点怕老婆啊?”因为按照一般人的思维,家庭经济地位决定着家庭的社会地位。这个人非常果断地回答:

“不会”。我说“为什么?”他说:“你想想我在组织部工作”。组织部开车的师傅他认为比当老板的老婆地位高,后来我参观企业的时候,接着问:“你怎么觉得比你老婆地位高?”他说“你不懂吧,你别看她当老板,她这个客户资源都是我给她拉的。生意上出了问题,我给她摆平。我给领导服务,我跑的地方,我见的人多,我的关系多。”后来我想了想,什么叫组织资源,这也是组织资源。这个人地位不高,但本事不小。

因为职业也可以带来人财物的交易,也有组织资源。那么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个组织资源问题。因为经济资源、文化资源比较好理解。有职称学历就是文化资源,教书拿钱不多,有点水平,大家尊重,也可以开发社会地位。那么今天要讲组织资源,大家注意一个现象,就是市场经济不断建立和完善的今天,组织资源在配置资源、影响人们的阶层位置是弱还是强了?按道理是在市场经济,应该是要弱,但是我们看到的是,它不仅没有弱,在一些地方,在一些时候强化。

为什么这么说,去年3月份南方周末有一篇文章,标题叫《年轻人到体制里去》,这什么意思,你的孩子大学毕业,我的孩子大学毕业了,除了出国以外要就业,考公务员,到国有企业去,到央企去,是不是这样?这些单位收入不一定很高,但很稳定,很体面,它有一定的组织资源,对不对?所以我说这件事它并不是一件好的事情,如果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所有最优秀的人才都集中到组织体系里来,这并不是一件好事。

那么前几年我自己写了一篇文章,当代社会阶层结构出现一些新的变化。

第一,阶层结构出现定型化趋势,阶层边界逐渐明晰。

什么叫阶层边界?什么叫阶层结构定型

化趋势、低层社会阶层固化?前几年单位有一篇文章,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说身份的固化已经扩大人们得收入差距,改革开放近十几年和前十几年相比,我们底层社会这个结构变化速度放慢,慢慢人们地位沉淀固化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我们向上的流动力,人们向上的速度放缓了,空间变小了,难度变大了。前几年讲这个观点的时候,高层领导干部不同意,他们讨论说:你讲的不对,说我国改革开放这十几年来,我们的GDP几乎是保持二位数、10%以上的速度在增长。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很多空缺的就业岗位,这些岗位是需要人去占领,必然会抬高人们的社会地位,怎么会向上流动降低?我说你用社会分层的眼光,你看你的优势,社会地位,谁也拿不走。你们自己回想一下,实际上你比如说好的职业,好的机会,实际越来越向小部分中上层人集中,我的博士生导师,十几年前他就跟我们讲,他在北大上学的时候,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上北京大学的时候,北京大学的农村大学生要占到70%,但是前几年据说北京农村学员只占30%。去年我看到一个网上的研究报告,说现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农村的学员只占10%,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是国家最顶级的大学,大学毕业生就业,100%大学毕业不求找不到工作。但大学教育现在国家也从精英教育变成平民教育、大众教育,这是历史的进程。但是你要细细看,我们优质的教育资源,在不同群体分布极不均匀,谁拿走了这个优质的教育?农村的孩子也上了大学,那上了大学毕业以后干什么?我经常讲像我这样的人,我是农村出来的,我1981年考上师范,脱离农村,穿上皮鞋,带上怀表,吃上米粮,跳龙门,我非常幸运。经过30多年的奋斗,我现在当了教授,很幸运。我说要我那些农村亲戚的孩子现在要像我这样,通过二、三

十年奋斗,达到我这个水平,非常非常成功,我庆幸我生得恰当,生逢其时,我生得恰到好处,早几年根本没学上,我78年上初中,当时还在想着能不能推荐上初中,后来78年改革开放,好学习,我成绩好,自然上了。后为什么上中专了,家庭出生不太好,父母担心,你赶快考,政策一变,你就出不去了。所以没上高中,上了小师范,后来上大学、上研究生、上博士生,这样一路走。所以说非常感谢改革开放,感谢小平同志,让我们脱离了农村。那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当时30年前我们底层这些孩子有机会,那么后来我讲这个观点的时候,也有人提出异议,说你讲的不对,说农民工2亿多人都出来打工,改变了身份,改变了命运,怎么向上流动又降低了。

第二,阶层复制现象增多。

我再讲一个观点,叫阶层复制现象增多,什么叫阶级复制,一个家庭两代人之间,在同一个年龄拿职业来测量。比如说我,20岁的时候如果考上大学,到北京来打工,叫农民工,干了20多年回家。我儿子20岁,他考上大学,到北京打工,他20岁的时候和我20岁的时候都是农民工,这叫阶层的复制。尽管我儿子现在一个月拿2000多元钱,20年前我拿100元钱,他是我工资的20倍,他在社会的相对地位并没有根本的改变,所以你看1亿左右的新生代农民工,我们外出务工、经商、跨乡镇,流动的1.59亿左右。跟总理讲,其中有60%是新生代,有改革开放80后、90后这些孩子,这些人跟他父辈,地位没有根本的改变,这是一个问题。讲复制是一个学术的语言,我1978年前就提出来,实际上我们网络上,叫二代。用二代网络还可以造句,有“官二代”,有“富二代”,有“农二代”、有“星二代”,还有“穷二代”。我前年在北京日报上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因为我跟省长讲课,有好几

个省长、市长,跟我讨论,我一讲这个问题,他非常激动,说:老师你讲的不对,你好好别老研究这事;说:老布什可以当总统,可小布什不也当总统,怎么“官二代”不行?因为他们这高级领导干部有意见,后来我就说算了,这个事,不讲了,我回头就替北京日报写了一篇文章——《正确看待这个“二代”现象》阶层复制现象。有“官二代”、“富二代”不可怕,可怕的是流动机制渠道不合理,老布什可以当总统,小布什也可以当总统,关键是他要通过选举。老子是富翁,儿子当然是富翁,穷光蛋没问题,是发财的渠道。但可怕的是什么,我们“穷二代”、“农二代”看不到希望,底层社会看不到希望,这个是个麻烦,我强调的是这个层面。

第三,中国社会出现失意阶层,一些社会阶层群体相对社会地位下降。在企业改革里,在城市拆迁里面,在农村征地方面,能够得到保护,尽可能地保护。

第四,中产阶级发育速度放缓。大家知道,我们社会要长治久安,从社会结构、阶层结构来讲,应该是一个“橄榄”型,中间大,两头小,穷人和富人比较少,中产阶级比较发育,比较壮大。这些年来,我们的中产阶级,也在扩大,但是很可惜,我们注意到这几年,人们中产阶级发育放缓?为什么,股市不景气,有些人资产马上缩水,炒股炒成股东,股民变成股东,房价一上涨,一些小白领、大学生一毕业马上变成全新的夹空层,所以我们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的院长李强教授讲:“中国社会还是一个什么的阶层,这个社会结构叫倒‘钉子’型结构,既不是金字塔,也不“橄榄”型,是个倒“钉子”型,这就比较危险。

第三个变化,社会的需求变化。

在人们社会地位变化、阶层变化的同时,人们需要机构变化,表现为:多样化、差别化、高级化。具体来讲,就是当前,人们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吃穿住行不再是人们最大的困难。基本生存需求逐渐得到满足,基本需求的标准在逐步提高。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太穷、太苦了,但现在,人们的温饱问题都解决了,基本上解决。所以2008年世界银行有篇报告,说回顾过去1988年—2008年,世界的反贫困成就,如果不考虑中国的因素,世界的贫困人口是增加的;考虑中国的因素,世界的贫困人口才下降了。中国对世界的脱贫,做出了最大的贡献。

发展需求越来越强烈,权利需求凸显。十七大报告里提到,现在民生问题凸显,大家都知道这个词吧,叫民生问题很突出,我就反问了一句,我说:“难道我们改革开放干了30年,这就吃不饱了,穿不暖了,民生问题不是吃饭、住房、穿衣、教育、医疗吗?”分配不公,更主要的是人们需要的标准提了高。现在人们的需要不再是简单的吃饱、穿暖的问题,我经常教育我的孩子,你要好好学习,我给你创造的条件不错了,老爸那时在农村很苦啊!你得好好学习。讲多了,他说我;“你这观点不对,社会总是向前发展,你老往后看,不往前看。”他的标准就不一样。那么现在的标准是什么?人们要求什么?要求发展,要求主张自己的权力。讲教育问题,也不是有没有学上,是要有好学上,对不对?是这个问题,要公平教育,全力地凸显。

2002—2003年我在江苏海云市挂职当副市长,2003年我回来,2005年第一次回去,我跟当地的书记、市长聊天,我就问他:“现在工作怎么样,好做吗?”“有压力”,说群众见识广,老百姓讲:“有吃有喝不求你,不偷不抢不怕你。有事情我要找你,不管不问要告你。”

他们现在工作压力大，这些老百姓主张自己的权利，法律意识、维权意识增强，所以十七大报告有一句话叫，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政治参与热情是不断高涨。

第三个变化，群体之间和代际之间需求差异较大。刚才我们提出，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每年一到春节过后，南方像广东、浙江这些沿海地方，出现了所谓的“民工荒”，招不到工人并不是真的农民工短缺。后来我总结了一下，实际上是新生代农民工，他的需求标准提高，要求变大，所以这是其中一个原因，新生代农民工跟老一代农民工要求变了，我说什么不同，“三高二低”五个不同。第一是他的薪酬待遇要求高了，就是工资水平比过去要高；第二是职业发展期待高，过去有钱挣的活就去干，现在不行了，要看这个活对个人的能力素质提高有帮助；第三是权益保护要求高了，人格尊严、社会保险、社会保障、基本权利是否得到了实现。这是“三高”。“二低”是什么？第一是这些新生代农民工跟老一代农民工相比，像我们这个年纪，跟大人相比，他们没有真正的农民生活，毕业以后，就出去务工经商，所以他们没吃过苦，更重要的是这些人他们生活在、生长在什么时代——数字化时代。拿着手机，上着互联网，看着电脑，看着电视，脑子里的信息跟沿海发达地方、跟城市没有太大的区别，他的期望值不一样，所以太累、太苦的活他就不愿意干。但总体来讲，外出的农民工，他是能够吃得苦，但相对父辈而言，吃苦耐劳的能力降低了。第二个下降是什么呢？是返乡务农的低了，出来了就没想到再回去种地。尽管2008年遇到金融风暴，东莞很多工厂都关门了，沿海发达地方企业倒闭了，那么我们很多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回去了。根据农业部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的监测，返乡的农民工大部分实际上没有回

到土地，而是在当地县城和小城镇寻找就业机会，不愿再种地。那么，我想这些表明什么，我不是讲农民问题、农业问题，是讲这些现象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和老一代的要求不一样。

第四个变化，社会安全需求凸显（养老、住房、医疗、就业）。

改革开放30年，前十几年和后十几年对比，中国社会发生了五个转变。这五个转变，前三个是一个层次，是一个问题。第一个财富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它是一个物的转变，物的转变带来的是第二个的影响——人的转变，人的什么转变？人的社会地位、阶层结构的变化是人的变化，人的地位变化的同时，人的主客观的需要。这个需要既有主观的又有客观的。马斯诺讲需要层次从客观向主观方向发展，三者是否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这是一个类型，一个层次。那么这三者的变化带来的第二个层次的影响，后果表现在两方面。第一，社会问题从生存现象向公平转变。现在我们在基层工作，会遇到很多上访告状的事件，这一矛盾，征地拆迁问题、社会保障问题、涉法涉诉问题、军转干的问题、企业改制的问题，零零总总、纷繁复杂。所有的社会问题，可以说绝大多数的社会问题，背后，就是他们讲的一句话，现在很多社会问题从物质方面来讲，不是多和少的问题，而是有和无的问题，就是一个公平公正的问题。绝大多数告状的、打官司的都说不公平，公平正义没有很好地解决。所以，我讲中国改革开放这30多年，就相当于马拉松赛跑，如果你回头看的话，实际上90%的人都已经离开原点往前走。但是，如果往前看，你会发现有人跑2万米，有的人跑1万8千米，有的可能只有20米，差距相当大。原来我们都在一个起跑线，为什么

你跑前面去,公平正义的问题就产生了。你致富的合法性、合理性就受到了质疑,所以说现在很多人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他不是因为生活没有改善,他是因为他跟左邻右舍相比,相对的社会地位下降了。

第五个转变,社会矛盾从个体向群体性转变。

2000年以前,我们城乡、基层很多社会矛盾个体化,比如说在农村,有宅基地纠纷,有山林承包地纠纷。在城市有厂家、商家、消费者之间的纠纷,这些是个体的纠纷。但是到了现在,每年发生大量的群体事件,它表明的是什么?是一个群体和另外一个群体。这几年发生的云南孟连事件、贵州的瓮安事件等等。它是干群的冲击、劳资的对立、警民关系的不和谐。去年在广东、在浙江还出现了本地人和外地人的冲突,广州有一时间,四川籍的农民工和广州本地的农民工发生大规模的冲突。去年浙江湖州织里镇,安徽籍的农民工和当地农民工发生冲突,几万人持续数日的冲突,是一个群体和另外一个群体的冲突。现在社会上,出现一个不健康的心态叫仇富、仇官、仇警。所以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一个个体性。所以中央有个词叫无直接利益冲突矛盾增多。那些大规模的冲突,参与的、围观的并不是说跟事件有直接的关系,没有直接关系,但是不是完全是盲从、看热闹,不是,是借此发泄心中的不满,是无直接利益之间的冲突,毕竟它还有利益冲突。所以现在这些群体事件表现,多样多发,触点多、燃点低、观点性强。很多市委书记、市长跟我讲,说现在我们在基层工作,压力非常大,叫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半夜来电话,不是哪儿爆炸了,就是哪儿上街了,压力非常大。

这是我讲的第一个大的方面。由改革开放30多年,前十几年和后十几年对比的看,我们发生五个变化,这五个变化是两个层次,前三个是一个层次,后两个是另外一个层次,如果说前三个是原因的话,后两个就是结果。它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就是社会不稳定的东西不断加大。社会的矛盾、社会问题不断积累,社会性质不断发生变化,给我们带来的影响就是社会的不稳定的风险不断加大,那么这样的分析是一种历史性的分析,纵向的分析。

如果我们换一种思路看,当下中国社会风险挑战是什么?我认为是二个,第一是既得利益群体出现,与公民意识增强之间的矛盾。改革发展的今天,实际我们已经出现大大小小的利益群体,甚至用比较难听的话,尖刻一点的语言,叫利益集团既、得利益群体。在任何社会它们都是客观存在的,但问题是它们的行为,它们的利益表达,应该符合法律的规定,尤其是不能过大地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但是反过来看,我们利益集团,现在利益群体它对我们的公共政策的制定、重大利益的制定产生了极强的影响。所以说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最近国家总理答记者问,说我们这两年,房地产调控初现成效,还要毫不动摇的坚持调控的方向和力度。这前几年有人讥讽我们说:房价越调越高,政策出不了中南海。当你回头想,这背后为什么会这样,它是很多地方、甚至开发商对抗中央政策。去年温总理谈到房地产说了一句话,说:希望房地产商人血液里是流着道德的血液。后来有一个北京的房地产大商,就说了一句话,说:请问总理,您的血液里是流淌着什么样的血液?你看这就是这帮人在对抗。去年冬天12月份,中央电视台有一个新闻栏目叫《新闻一家人》,讲一件事情,中央电视台派了好多记

者,到全国各地采访,说:在交通公路上,每到冬天,要加柴油的大货车,柴油加不上。记者过去采访,说炼油企业现在没有问题,在生产,保障供用。采访专家说国际市场油品非常平稳,那为什么在中方购油都加不上柴油。我问国家能源局的专家,能源局的专家讲:现在就是这些炼油企业,油价格低,他要挟政府涨价,不卖。这些就是既得利益集团、既得利益群体影响了公共政策的例子。那么问题是什么呢?问题又是我们现在是一个公民时代,不是臣民的时代,公民是主张自己权利的,知道维护自己的利益的,不是臣民,那就有可能造成很大的矛盾和冲突。因此,我讲进一步中国的改革发展,现在最大的阻力是什么?最大的风险来自什么?来自于既得利益集体。今年有些同志注意到了,我们南方思想比较活跃。借纪念小平南方谈话 20 周年之际,舆论都在讨论什么事情啊?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快改革步伐。南方有些省级领导说:现在最大的改革阻力就是要破除利益集团的障碍。广东省的领导比较支持,我是比较认同的。所以我经常讲,现在进一步,改革的动力在哪里,改革的主体是谁,改革的依靠力量是谁,这个问题跟 30 年前可能发生了一些变化,所以说我们讲改革 30 年重要的经验是什么?是摸着石头过河。但问题现在有些既得利益集团摸着摸着就上瘾了,只摸石头不过河了。有些人觉得改革进入深水期了,石头在哪儿,摸不着。

那么再往下讲,我们面临的第二个挑战就是:虚拟社会形成与社会认同难度加大这样一个风险。虚拟社会的出现为公民参与、人们的表达提供了很多方便,但是,对社会关系稳定,那么也构成了极大的挑战。社会和谐稳定,它不完全在于财富的多少,关键在于什么?关键是人心的相背、主流价值观的认同、

核心价值观的形成,但是问题是现在我们多元思想激荡的时代,表达多渠道的时代,它对我们主流的价值观、传统的世界观产生了极大的挑战。大家知道,现在舆论宣传,我们党、我们国家掌握的机器,坦率地讲是不占有主导优势。现在是两个舆论场,一个是我们控制的这个电视,还有一个是民间庞大的网络。网络我们试图也在影响和主导它,但是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困难。我前一段时间,陪我们领导去人民网考察,有一个同志给我们介绍情况,我觉得压力很大。人民网是我们打造的网络阵地,你比如讲我们每天的访问量是 3 亿 Tb,3 亿流量,但跟新浪百度相比,我们差了 7、8 倍,他们定位说:我们人民网定位是最为影响力的。后来我们讨论说,光影响这些人不行。我儿子他们不看人民网,我儿子说:爸,人民网就是你们这些体制人看,我们不看的。人民网同志他们给我们座谈,他也讲了一个调侃的话,说现在电视、新闻联播随便看,说我们这些体制的人看,大家总结了一个公式,说新闻联播前 10 分钟领导很忙,中间 15 分钟中国人民很幸福,后面 5 分钟外国很乱。你要说你觉得中国人民很幸福你就看新闻联播。如果说要看中国社会问题,就看网络,这两个舆论场他们提供的信息都是不完整的。怎么样理解,有很大挑战。

那么我讲这些不是否定改革开放上的成就,中国确实它有特殊性。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用了 30 年的时间,走了发达国家 100 多年的路,甚至 200 年的路。人家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信息化,用了 100-200 年的时间才完成,我们是用 30 年,人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里面渐次出现的问题,我们在一个时间压缩的环境下,集中表现出来,所以必然是矛盾的高发期、频发期。当然我们也是一个发展的重要战略期。因为这样,所以总书记去

年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讲:当代中国正经历着空前广泛的社会变革。这种变革在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的同时,也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社会矛盾运动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我们要遵循社会发展规律,主动正视矛盾,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不断为减少和化解矛盾,培植物质基础、增强精神力量、完善政策措施、强化制度保障,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讲了半天,落脚点就是一句话,为什么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因为我们既是发展的重要战略期,也是矛盾的凸显期,我们在改革发展的里面,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同时也蕴含的极大社会的风险,因此我们需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那么应对这种风险能力怎么样呢?

二、社会管理能力不强

第二个方面我国应对这种社会稳定的风险,也就是社会管理的能力,还不够强。所以前两年我写了一篇文章——《当前中国社会管理存在的六大问题》。

(一)社会管理的理念不到位

我们现在的同志还是习惯于、热衷于搞拼图建设,对忽视社会建设、社会管理,把经济建设放在中心位置,没有错,而且还要毫不动摇地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思想,但问题是,我们不能把经济建设当作唯一的東西,经济建设是第一,但不是唯一。问题,第一,重经济建设、轻社会管理。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要迈开步伐,保持平衡;第二,我们的现实生活里面,重强势群体权利保障、弱势群体权利保障;第三,管控思想严重、服务意识淡薄;第四,重事后控制,轻源头治理。

(二)社会管理主体不够多元化

政府包揽一切,不堪重负。有些地方,有不到位的地方,所以说我们政府管理越位、错位、还有不到位的地方经常发生。2007年我到广东省委讲课时,到深圳和东莞去调研,第一站,我不知道你们熟不熟悉——东莞,我去了东莞以后,印象非常深刻,它有很多镇非常强,比如说虎门镇、唐夏镇、长安镇,一个镇,它的经济实力,它的常驻人口甚至比我们中国地级市还要多、还要强,我说你东莞多少人?他们告诉我东莞户籍人口172万,我说实际人口,实际常驻人口1200多万,我说1千多万,我怎么看不到人啊!大街上看不到人,你要去东莞大街上,跟深圳不一样,它不繁华,我说人都到哪去了?你们说人哪去了?在工厂里面做工,因为他们深圳的产业结构不一样,制造业基地。一把大锁,一关几万人。后来我脑子里面出现一个问题,我说:这一千多万人,谁在管?当地政府并没有履行管理这些人的责任。我说如果不强化这些私营企业主、这些厂家、这些厂商对外来民工社会管理的责任,早晚可能会管出事。

回来我还写了一篇文章,就是讲关于社会管理领域出现空白。2008年奥运会召开之前,北京市1247座高层商业楼宇,现在市场化了,这里面什么单位、什么人在里面,不清楚,所以为了搞平安奥运,北京想了一个办法,说要把这些搞清楚,说党委、政府要进去,搞楼宇工作站,才把这些企业、公司、人员基本情况搞清楚。所以说你看现在政府很强大,往往有些有苦难言,这是第二个。

(三)社会管理方式不够灵活

我们还是习惯于行政管制,那么公民的自我管理、企业的管理、自治管理,对传统的那些管理的手段、资源、利益。中国社会有两个比较特殊的情况,第一个是我们的网络民

意汹涌澎湃。西方社会没有。西方人善于干什么? 互通信息、联系、购物、交友。中国人很多人上网,发表高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都是政治家热血沸腾。农民好好种地,工人好好做工,最大的政治。但是中国社会它存在合理,为什么人们习惯于、热衷于上网,发表高见,是因为我们现实社会里面很多渠道不通。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第二个现象,你们在基层工作,可能也比较头痛的是什么? 就是信访,现在叫信访不信法,信上不信下,这个事比较突出。去年年初,湖南卫视有一期节目叫《岳麓时间论坛》,邀请我当嘉宾,去做了一个节目,我跟几个专家,一块讨论信访的问题,但意见很不统一,尤其是法学家们认为这种信访是人治,就应该取消,后来录了几个小时以后下来,我们宣传部长讲,说今天这个节目可能播不去了。

(四)社会管理法规不健全

社会领域立法严重迟误,尽管吴邦国委员长说,现在的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了,但是我们要细细看,社会组织、媒体谁管呢?没有法,宣传部天天打电话,递条子,开会。去年一个小姑娘吹牛皮,说我干爸、你干爹,彭红贵,是总经理,开着宝马。红十字会,全国人民捐钱,你怎么挥霍?红十字信用一落千丈,没人给它捐钱,后来一查,她跟红十字会啥事也没有,几乎没有关系,但是你怎么追究她的责任呢?

(五)社会管理载体不够明确

我们现说单位人变成了社会人,但是坦率的讲,在坐的各位包括我还不是社会人,还是单位人。我到社区去调研,大家跟我讲:现在社区主要是管两种人,老头、老太太和孩子。所以说,不要以为都是社会人,说载体,单位、社会、社区都应该发挥作用。

(六)社会管理人才缺乏

我们现在的领导干部不太善于搞社会管理,过去搞经济建设,搞招商引资,有了应对的办法,但对社会管理确实需要共同研究和面对。

社会专业化人才严重失缺。中央去年发了文,要求要培养专业人才,其中包括社会工作者,社会工作者不是社区戴红章的老太太,要专业化、职业化,要经过训练、考核的、资格认证的那些人,相当于律师、会计师、审计师,所以说社会工作者是什么? 社会工作者是一个岗位,社会工作者是拿工资的,他是帮助别人做好事,像雷锋一样,但是他也是拿工资的。中央发展规划讲,2015年我们中国要培养200万专业社工队伍,2020年要培养300万,最近民政部发表将进一步落实,但是我们看这个任务相当艰巨。

怎样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怎样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我两句话告诉大家：第一，以社会建设推进社会管理；第二，在统筹兼顾中推进社会管理创新。

三、以社会建设推进社会管理

先说第一个观点。以社会建设推进社会管理实际上涉及两个概念。第一个概念就是社会管理，第二个是社会建设，也就是说要正确处理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

我认为现在各级领导干部包括专家、学者对社会管理的理解，把握并不相同，并不完全一致，有的讲得很大，有的讲得很小。最广义的理解是与自然界相对的人类社会的管理就是社会管理。

第二种，经济社会二分法中的社会管理。我们习惯讲经济社会发展、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经济社会发展，那么，管理是讲以经济相对的那个社会的管理。

第三个是人类社会有三个大的领域。一个是国家、一个是市场，还有一个是公民社会（社会组织），那么有一种观点讲公民社会是社会组织的管理。

第四个，2003年我们国家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要四大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四位一体，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

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那么社会建设自然有社会管理。

第五是政府职能，四大职能之一。2003年中央政府明确提出我们要建立有限政府，政府职能是有边界，不是说无限，政府有些事情可以做，有些事情不能做。哪些可以做？经济建设，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管理四大职能。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可以进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县级政府不能完全这样讲，乡镇更不能这样讲。一个乡镇到哪去监管、到哪去调解。所以去年中央政府明确提出来，今后乡镇、街道的政府职能主要应该做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招商引资这个事不要去管，没有这个能力。因此，我们说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是无论哪一级政府都应该承担的主要职责，所以说社会管理是政府主要的责任。我们党委、政府其实讲社会管理最多的是哪一个部门，是政法、公安这个系统，永康同志前几年就提出，公安政法系统要做三样事情，三样工作，叫“社会矛盾化解”、“公正严谨执法”和“社会管理创新”。因为做得好、做得早、做得有成效，所以社会管理创新现在由谁牵头？政法委牵头。去年8月份，中央政府下面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更名为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由他们来牵头下令设了八个组，具体联络、研究、协调社会管理的事。民政也在搞社会管理创新这个事。

那么我们所认识的社会管理是什么？党委和政府以及其他社会主体运用法律、法规、政策、道德、价值观等社会规范体系，直接或间接地对社会领域各方面、各环节进行服务、协调、组织、监控的过程和活动。这个概念，比较长、比较抽象，我讲四个要点：

第一，管理的主体。党委和政府以及其他社会主体。

第二，管理的工具。是社会规范体系，社会规范体系包括两个层面，正式和非正式。正式是法律、法规、政策；非正式是道德和价值观。

第三，社会管理的对象是社会理念各环节、各方面。

第四，社会管理的方式是服务、协调、组织和监控。

再讲一遍，这个概念它包括的要点是主体、工具、对象和方式。但尽管如此，我们认为这个定义还不完善，还可以继续讨论，尤其这个比较高度概况比较理论，对我们实际工作指导性不强。去年总书记讲了一句话，中央党校讲课的，社会管理的基本任务是七项：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七个方面。这七个方面，我认为总书记讲的七项至少三个层次。促进社会公正是第一个层次，用我的话来讲，叫立足公平正义，维护群众权益，是进行社会管理的价值准则，是立场，是价值尺度，没有公平正义，没有群众维护就无所谓社会管理，这是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是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应对社会风险，这五句话是社会管理的主要工作；第三个层次最后一个保持社会稳定，社会管理要实现什么目标，长治久安。所以我们说它是三个层次，价值准则、主要工作和管理目

的。此外，社会管理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增进社会认同。我前面已经提到了最大的挑战之一是虚拟社会的形成和社会认同难度加大。中国社会几千年，社会管理的一条主线，就是去乱惩治，就是两个方面的管理，一个是人心管理，一个是行为管理。人心管理靠德治，行为管理靠法治。所以中国古代社会有一句话叫：礼法融合。所以我们说人心管理是社会管理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舆论的引导，心理的调节，核心价值理念的形成，社会风尚的塑造，都是社会管理非常重要工作。那么一句话就是增进社会认同。最后，社会管理的最终目的是保持社会稳定，但是现在还应该强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激发社会活力，应该是治理和活力的统一。如果单纯的强调社会管理的目的是社会稳定，那就有可能走向社会管控的老路。所以，总书记不断地强调三个最大限度，第一个最大的限度是激发社会活力，第二最大的限度是增加和谐因素，第三个最大的限度是减少不和谐因素。激发社会活力是社会管理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再往下讲，我们现在的基本任务是什么？中央提出了八项重点工作，根据我的理解，讲一些认识。

第一，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社会管理格局。2003年中央就提出来了，说社会管理要构建一个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社会管理新格局。我给大家讲三个认识，第一，概括不够准确，还是要进一步完善，你想想这四句话，前二句话，后二句话，其实都不准确。第一叫党委领导、政府负责，很容易让人产生错觉，叫领导不负责，负责不领导。党委领导、政府负责，出了事你负责，不够准确。第二，后面不太全面，怎么叫不全面，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社会在你们脑子里面是什么，你们想到的什么？是社会组织。再大一点还有

人民团体,工青妇,这些部门,别忘了社会管理我们还有企事业单位这一块。所以我们说,这四句话是有毛病的。当时我要公开发表言论,我说你把社会参与范围要理解大一点,包括社会组织和个人企业单位以及市场的力量,不要仅仅的限于社会组织。这是我给大家讲的第二个观点,社会管理格局不限于那四句话。

第三个要给大家讲的一个观点,现在我们前二句话,是讲党委政府,后二句话是社会协同、公共参与,协同的问题、辅助的问题,但是我认为不能简单的把这个协同辅助理解成辅助的问题。在当下的中国已经着力发展后面两个部分,辅助还停留在原来的思路上面,我们永远改变不了党政包揽天下这个社会格局。这是我讲的三层意思。

第二,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去年7月5日中央发改委文件,专门就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若干重大问题专题部署。我去年9月26日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我说要构筑群众权益的五大机制,学习这个文件,谈谈认识,我就讲一个观点,我说现在中央提出了要构建保障群众权益机制、利益协调机制、劳动关系调整机制、劳动纠纷解决机制,还有重大决策风险机制,这个非常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给群众有一个诉求表达的机制,让老百姓说话,让老百姓利益诉求,让领导干部能够知道,所以我们对公民的参与,要开通渠道。

第三,流动人口和特殊人群管理和服务。我先说认识,严格地讲,要从写文件的角度来讲,流动人口和特殊人群不应该放在这一条,因为这是两个不同的群体,完全不同的群体,特殊人群是指什么?政法委书记说是指流浪乞讨的、有不良行为的青少年、父母服刑劳教的未成年子女、艾滋病患者、精神病患者、社区矫正的人员、劳改释放的这些,有可能仇视

社会,有可能对政府不满的这些人群叫特殊人群。当然我们也需要特殊的专业组织,我们不细说了。那么流动人口是什么,流动人口主要是指农民工,它跟它性质不一样。所以我们中央有个明确的要求,就是逐步把流动人口纳入到常住人口里面,去管理基本的公共服务。今年要做两件事,第一是要建立国家的人口基础信息库,你基础信息都不知道,你怎么完成,要汇总各方的信息,变成一卡通。那么,第二要建立居住证制,居民办这个居住证。随着农村人口的大量外出务工的产生,也出现了一些特殊人群,积极需要关注,一个是留守老人,还有留守妇女、留守儿童。我今年正月十六和几个同志到我原来挂职的地方,江苏凯旋市,他们给我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也很让人痛心啊,因为那个地方是比较发达的地区,100万人口去年财政收入120亿,老百姓日子都不错,很多人出去打工,有大量的留守妇女在家里,但这里面就出现了一些婚姻的危机。所以他们还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词叫农村小三出现了,一个妇女同志,因为红杏出墙,婚姻也产生危机。老人家里面没有人护理、照顾,孩子监护也出问题。全国这样的人口有七、八千万人,是一个庞大的群体要关注。

第四,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

第五,公共安全体系。公共安全包括三个方面,1、生产安全。生产包括交通;2、食品药品安全;3、社会治安。这三个方面,要扩大点,这网络安全也属于公共安全范畴。网络安全现在不单独讲,怎么管,符合中央一系列的要求。

第六,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管理。这五个领域,两新组织,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我们刚才在格局里面已经强调说,

我们非公共经济组织，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管理的主体，他们要做什么，要维护权益，要构建和谐关系，要防止出现罢工、停工事件。这是说他们是社会管理的主体。第二层社会管理的意思就是说，要鼓励他们走出单位，进入社区，进入社会，给社会更大的社会责任。环境保护，比如说深圳公益活动，也是社会管理问题。同时，他们还是社会管理的个体。党和政府要加强他们的管理、服务和引导，防止他们侵害职工权益，做违法犯罪的事情。

第七，信息网络管理。刚才讲的，现在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对我们党执政非常大。坦率的讲，我要从另外一个方面讲，我们改革里的驱动力量，也是信息网络，虚拟社会。我刚才讲的，既得利益群体出现了，就很难自己革自己的命，靠什么？靠外国人的技术，信息网络。

所以这事是利有弊的事情。那么对这件事怎么管，我讲两层意思。第一层，管什么？信息网络管什么，现在我要管三件事。

1、净化信息环境。净化信息环境包括要发布真实的信息，发布健康的信息，防止虚假、欺骗、欺诈的信息出现，防止黄、赌、毒有害信息出现，净化信息环境。可能同志们注意到网络违法犯罪、欺诈的信息很多，包括最近还有谣言，谣言要打击。那天有个同志问，什么叫网络谣言？怎么区分网络谣言和网络流言？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边界在哪里。我说这个事还得好好研究，他无心传播一个谣言，但并不是主观问题。对吧，这肯定变成流言。流言的过程中它就放大，加一些自己的理解，就变成了谣言。这里面责任怎么追究，需要认真的研究。但是我说的，他们学院没有很好的回答，我说我自己思考，就是网络这个谣言、流言。他的印象、他的身份、他的地位、他的社会影响，如果越大，如果定为谣言的可

能性就越大。我跟我们那个学院的同志说，我说在网络上传你，你是一个小人物，没事。我说你，谁有什么事，但是你要像涉及到上一次动用军车，要什么动用部队，你说是不是。可能要区分这个。第一个事情，要管什么，净化网络环境、信息环境。

2、要引导舆论。尤其今年是换届之年，各种势力跃跃欲试。确实要保持大局，要与中央保持一致。因为这么一个大国不能乱，确实要与党政保持高度一致。那么，就说我们这几个发生的虚拟社会、虚拟事件，它可以跟现实社会遥相呼应，互相放大，所以网络的舆论引导要管理。这是第二点。

3、网络泄密屡有发生。我前几年陪我们副院长去台湾考察，回来我也没注意，写了一个考察报告，后来有人说：你这个报告不能上网，我们两台机器，一台是不涉密机，一台是涉密机，对台比较敏感，不能上网。因为它是涉及到有高级领导干部、副部级领导干部去访问，见了很多台湾的，台湾部级以上的人物很多接触，我在办公室电脑前上网，时时告诫自己上网不要犯错。那么现在经济信息、政治信息很可能泄漏，这就是信息安全，要警钟长鸣，我们现在最安全的是送鸡毛信，还是人工最安全。那么这是讲的网络管理的第一句话，第一层意思，管理什么？

第二句话，怎么管，中央有一个明确的文件。四条原则，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是积极利用对于网络这一新鲜事物，是接受还是拒绝，有很多人恐网、怕网，那怎么办？中央很明确，需要积极利用，挡也挡不住，删删也删不掉，回归回归不了，怎么办？迎上去，积极利用。温家宝今年答记者会，张明权——中央电视台的记者问他，说有人给你灌水，还有人表扬你，你怎么办？总理讲得很好，说：啊呀！我从网民里面吸收了一些很好的建议，如果有

条件,我把它带给中央,给他们意见,开放的胸怀积极利用;第二是科学发展,所以我认为科学发展要有步骤去发展。因为西强我弱的格局,短时间难以改变,如果完全放开,我们受不了。我们以前到人民网去考察,陪我们的常务副院长去,人民网的总裁,你们都熟悉——邓亚萍,打乒乓球的,给我们介绍情况,说我们人民网是中央倾力打造的,是网络搜索的航空母舰,但是很可惜,现在中国搜索引擎没有一家可以走出中国。跟世界比较,搜索引擎公司差距非常之大,我们也发了很大的力气把中国研究院那些人请教,但是他们讲了一个数据,说:我们在人民网搜索,现在的业务量,业务能力,每几秒钟,是能够抓取网页 300 亿,我们普通人,我们网络学院的同志给我出主意,300 亿一个天文数字很大,但邓亚萍接着讲另外一数字,google,现在挡住了,google 每个月新增的业务是 300 亿网页,我们干了多少年,人家一个月增长 300 亿,所以我们说要完全放开不是一下的,要科学发展。

那么第三句话,依法管理,要制定互联网管理,现在在研究。

第四句话,确保安全。对共产党执行,对社会科学理念。

这是我讲的第七个方面。

第八,思想道德建设。去年中央召开了十七届三中全会,就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了专门决议。我认为,文化问题最核心的是思想道德建设,是社会科学价值观形成的问题,但是现在我们坦率的讲,有一个问题没有很好的解决,就是社会核心价值观没有提炼出来。当时我们学院的领导参加了这个决议起草,我们学院、我们部门也承担了当时前期工作。中央也设了 6 个调研组,研究、提炼什么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我这个部涉及文化,我也参加了,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条件成熟再讲,现在讲的是社会核心价值体系,但这个还不能很好的引领文化建设,为什么呢?因为太复杂,几个层次太复杂,另一个层次叫时代精神,公民道德里面,你有几个同志能记得“八荣八耻”?估计大都不记得。我 2006 年是中央组织部抽调的,以全国县委书记、县长建设社会新农村搞了一个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延安、井冈山培训,我是讲师团成员,我是五个组里面其中一个、农村社会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十个组的专家之一。我讲了很多场报告,中央统一讲,当时就有稿不念稿,脱稿不离稿,你完全照稿念,人家县委书记、县长不爱听,“八荣八耻”是其中一个方面,我背过很多遍,实在背不住了。

四、社会管理中的几个关系

我去年年初,我写了一篇文章,应该有些影响,叫《社会管理和创新工作的十大关系》。很多杂志、网络、媒体都转载过,社会管理创新的十大关系,很多思想与前面讲课里面我们已经讲过了,不再重复了。我这里给大家简要的讲几个问题:

1、基层基础与顶层设计的关系。大家注意,我们搞社会管理创新,现在重点在基层,难点在基层,那么在做的也在基层,改革创新。去年广东省省委、政府还有广州市提出要学习香港,要先行搞社会改革、社会管理创新。所以他们一系列举措,比如在街道、社区搞了一个三中心,这样一个体制改革的改革。所谓三中心是什么呢?是行政服务中心、家政服务中心和综治维稳中心。队伍的综

合执法队伍,把劳动监查、文化、市场监执法,市场、市容、城管合在一起,可以对他们来讲一个创举,但认真调研,同志们告诉我说:这条路能走多远不好说。为什么?因为这每一个部门实际上他都有一个条块,基层像一个拼盘,拼在一块,拼不完,那么它这些人员的工资,他的竞升、管理都是向上的。如果下面这个体制整个改革的话,简单的把他拼在一块,就有可能不可持续,所以根据这样一个问题,我写了一篇文章,说我们不仅基层管理方式需要创新,更重要的是体制机制要在更高层次,顶层进行设计。应该借鉴新一轮的政府机构改革,来推进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历次政府改革机制经验告诉我们,基层、基础和顶层设计关系要处理好社会管理,

2、立足国情与学习借鉴的关系。大家知道,经济体制改革的时候,我们提出市场经济走西方还是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当时很激烈的争论,最后,顶住压力,走出了一条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现在搞社会体制改革,带有更强的政治性、敏感的话题。应该同样走中国的道路,要建立中国的社会管理体制。那么,后来中国特色的社会管理体制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我们进行慎重的研究,马凯同志概括讲要由政府为单一主体,单位管理为主要载体,以行政办法为主要手段,以管控为主要目的传统模式,向政府行政与社会自我调节、自治管理、良性管理、社区管理、单位管理,多种手段、综合运用、管理服务融合,有活力的、统一的,多元制共建共享新模式转变。话比较长,但是呢,应该说值得大家好好去回味,这是高度概括,其中有很多人的智慧。核心的理念就是多点治理,共建和谐。社会管理用一个时髦的话,实际上就是社会治理,多种平等、参与是这个思想,但是我们讲,我们现在要坚持走

中国特色社会管理的道路,并不意味着我们现在可以闭关自锁,可以夜郎自大,还应该学习和借鉴,国外一切有益的经验 and 作风。去年这个时候,我受美国艾森豪威尔基金会资助,去美国开展为期七周的考察,主要是研究美国的社会政策和社会制度,我给大家简单的讲几个故事,分享一下这50天点滴的见闻。那么我到美国去访问的时候,考察了很多NGO,就是民间组织、非政府组织,他们告诉我:你们考察的时候,听我们讲也没有什么印象,你去参加一些具体的活动。美国有很多穷人,那么谁给他们提供服务、提供帮助,政府有责任,但更重要的是民间组织给他们提供、志愿者给他们提供帮助。

去年4月19日,一年前,我到芝加哥去访问,他们安排参加一个给美国穷人提供救助的美国的一个组织,给几百万穷人分发食品,免费发放,这个食品哪来的,大公司、社会各界给他们捐钱、捐物,这些水果、蔬菜等食品出口生产不达标的,一分钱二分钱,忙这需要人工啊,整理、包装都是志愿者。我去了以后,你看这个穿白衣服的是我,我就问周围的小孩,你们干什么?孩子说:我们是中学生。大学生四月份放春假,有些孩子在美国学习,现在放假,放春假。我说:你们为什么要来?他们说:老师邀请的,学校邀请的。美国中学四年,学生必须有40个小时志愿劳动,义务劳动,没有40个小时你毕业不了,上不了大学,干一次给开你个证明记录一次。后来我又问周围的妇女、老人,我说:你们来有没有好处。当说到好处,说没好处不干啊,她说:有好处。我说:什么好处?他说:坐公交车可以免费,买东西可以打折,可以优惠。所以政府在政策、税收等等公共服务上面可以提供激励的政策。去年我有幸参观了微软公司,在西亚研发中心我去了美国在路易斯的培训中心,在

世界 500 强的保险公司访问，他们就跟我们讲：说我们这些大公司的员工也经常搞义务劳动、志愿者劳动。通过这种活动来搞团队建设。我说我们中国人搞团队建设干什么，我们搞一次聚餐、喝一次酒，我们出去郊游，我们出去打一场球是团队建设提高凝聚力，支部活动，我没想到要去做义工。所以他那志愿精神在社会管理里面，只靠政府不行。后来我到了加利福尼亚州去访问，我到州政府去访问的时候，他们那里一个社会福利局一个副局长接我，跟我讲：你看我们美国人也有穷人，也有乞丐，你到美国的大商场、地铁口都是有人举着牌子要钱，但是你注意，乞丐里面有几种人看不到，老人、残疾人、小孩看不到，这三种人。你看我们那残疾人多惨，要钱，小孩躺着，要钱的都是一些生活能自理的这些人。在这个意义上，政府不是不救助他们，他不愿意接受，甚至不满足于接受，因该说这些流浪乞讨的人完全是他自愿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那么这些儿童、老人？有。政府机构马上给你带走，马上给你提供必要的场所。小孩收走以后，通知你家长，家长没有能力养育他，取消你的监护权，不要你来探视，到哪去？有专门的机构。我在旧金山，参观这样一个机构，一个街道，我们叫社区服务中心，我早晨 6 点多钟，从宾馆出发步行到一个社区里面去访问，一大早去，有人已经安排了，一帮人自己带着饮料，什么咖啡、热茶啦，还有面包、奶酪，自己带着一些东西，一帮人啃。吃点、喝点，他知道有中国来的学者，坐下来，一放录像，说：我这个机构是收留旧金山地区流浪乞讨的这些未成年人，包括小孩、少年，他们在这接受教育，接受培训，我们给他提供吃的，合格了，我们给他们提供就业的机会，教他们怎么面试。参观这些孩子的学习，不要拍照，这些孩子有隐私，你可以拍照，但不能拍到这

些。后来坐下来座谈，这里的老板讲了一个事，他说：这里我们有一批孩子要出去，要找工作，我们要给他们提供像样的服装，西服、打领带，我遇到困难。我们也听明白了，因为好多都是街访邻居来的，来参观，这些人是什么，这些人是小老板，是买服装的小老板，听明白了，这小夫妻俩，这对黑人夫妻俩说：下一周我给你拿 30 套服装来，几杯牛奶，几杯热茶，几片面包，30 套服装到手了。这是慈善捐赠。所这个社会治理光靠政府不行，民间要发动起来，公民社会要成熟，我是说这个意思。后来我还问他们，我说：穷人，这个粮食、食物、蔬菜、水果发放，怎么发放？他们说：通过教堂、教区，联系一个教主。我说：你这发放要不要登记，要不要家庭财产的公示、审核？我们低保需要搞这个，民政部门需要登记。他说：公示吗，不需要。谁有困难，谁就有资格。没困难不会去。你看，这个事在中国做不成。中国你拿着免费的东西，放里面一放，有钱没钱的都去领。

我再给大家讲二个故事。我去年 4 月 21 号到美国有一个州，叫密苏里州去访问，密苏里州里面有一个市，这个市有一个女的，她是美国的艾森豪威尔基金会的。这个大姐啊，听说我是基金会成员，中国来的，主动邀请我到她家坐客，吃饭，跟我交流。我就问她，我说：你做什么工作？她说：我是美国密苏里州参议员、地区办公室主任。大家知道，美国这个国会是参政的，参议员和众议员，众议员是 100 个人，50 个州，一个州选 2 个。众议员下面 430 多个，50 个州，按人口比例大小分配的名额不一样。那么参议员的地位非常高，他立法的，所有的法案，需要通过参议员。国会每年会给参议员、众议员拨款几百万美元，怎么花，过多少人是自己的事情。一般情况下，一个参议员有 40、50 人为他服务，有一半人在

国会华盛顿替他服务，还有一半人在他所代表的选民、州服务，他所在的州的主要地方、城市都得设办事处。这个人就是密苏里州的，一个比较大的市，地区办公室主任，她自己还雇了几个跟她干活。我就问她：你每天干什么活。她说：我得联系选民，选民是地区的选民，要求下面的老板，在国会里面提出来，这种政策。我说：你有什么意见？她说：很多是反映的一些困难的问题，比如说：环境保护、噪音污染、垃圾筒建立等等这些事情，往往这些事情，反映的一些选民，一些当事人，情绪非常激动，行为还不规范，所以回来心情都不好，对我老公有点对不住他。他老公是一个医院集团的 CEO，非常有钱，黑人。我们经常早出去，很晚才回来，心情也不好。我一想她干这个事，跟我们各位什么部门、什么同志干过的差不多吧！信访，信访局，人家没有信访局。人家通过这样一个民意的代表，他们那是民意代表，台湾有民意代表。

后来我到了另外一个州，5月5日另外一个州，叫爱德华州，靠近加拿大中部，去访问，我去了，到美国以后，我说10年前我在美国做过访问，但没到过美国农村。我是农村长大的，我说特别想了解一下美国农民是怎么生活的，农村是什么样子，这个问题，今年我们美国艾森豪威尔基金会成员2个农场主，我安排你到他家住，好了，这样他主动邀请我到他家住了三晚上。爱德华州是一个地广人稀的州，主要是农业州，土地面积很大，150万亩。可能是因为人口稀少的的原因，农民也比较纯朴，而且也非常热情，开了一个皮卡车，不是小轿车，半截后车箱，到机场拉我。拉上我到哪儿？到当地的小镇上吃饭。除了这个高个子以外和这个白胡子以外，其他他们都是年轻人，三个人。这两个人是什么人，这两个人是爱得华州参议员，在这个地方办公室主任，

这个都是办公室主任，不是一个参议员，是两个参议员，分别是两个办公室主任，大高个子是什么人呢？是这个州的众议员的地区办公室主任，地位应该说比较高。我就问他们，跟他们交流：这次来，主要了解美国的社会政策，其中包括奥巴马的竞选政策，医保政策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美国也是一样。80%的人都是商业保险，没有社会保险，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说医保政策，听到的声音是一样的，有人赞成，有人反对，我说不知道你那是什麼意见，听完我这一讲，他们三个人异口同声说，非常一致，说：我们反对奥巴马，因为奥巴马这个改革把政府搞得越来越大，负担越来越重，破坏了美国独立，个人负责的这种精神。这样一讲，接待我们的农场主非常高兴，说你们这观点对，奥巴马天天把手放在我的口袋里，想掏我的钱。因为农场主夫妻俩不到40岁，2个孩子，大的14岁，小的12岁，耕种了多少亩土地啊，1万2千亩土地，5万亩良田，每年100多万斤小麦，几百万斤大豆，相当有钱，千万富翁，无人飞机喷洒农药，喷洒种子机器，示范了给我们看了看，一个小时喷了一百亩地，非常厉害，所以他有錢。那么他这样一说啊，让我感动，一个农场主，在我们看来，相当于我们省委书记、省长的秘书，这样说话，说你要不反对奥巴马，农场主不可请你们吃饭。让我们更想不到的是，吃完饭他们说很忙，还要去联系选民，看着他们自己把钱包掏出来，分别掏出钱包自己付账，我看看付账，当时我还没有思想准备了，中国人没这个付账的习惯，我也把钱包掏出来，实际上并没有多少钱，因为吃的都是快餐，不到20美元，10几美元，我就掏出两张美元，10块钱一张，20块钱，这个还很仗义，把我的手按住，说你是客人，我替你付，这就让我更感动了，不是感动他跟我付账，我就想，他要请这三人来吃

饭,并没有给他付钱啊,只是给他提供了来自遥远的中国学者交流的机会。后来我又问,照相的时候,我问那个大高个子,我说:你的老板今年要选举,你们众议员是干二年,参议员是四年,轮换部分,选民要换一部分,你老板今年要选,如果选不上,你怎么办,老板选不上,只可能有第一种,新的众议员继续雇,假如不雇你呢?不雇我自找门路,要么当大学老师,要么经商,要么办企业。所以我说:他们的业绩跟他老板能不能进一步继续当选,息息相关,那么老板能不能当选跟他的饭碗密切相关,所以他们敬业,没人给你提供稳定的铁饭碗。我也去访问过一些政治家,他们非常敬业。所以我说这些事呢,是表达思想,我们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道路,但并不排斥国外学习。

3、社会管理与社会建设的关系。社会管理怎么管?要以社会建设来推进,那么这就是另一个概念,社会建设是什么?2007年十七大报告,提出了一个观点要加快社会建设,加快民生改善社会建设,社会建设就等于民生建设,社会事业发展对不对,也对,但不准确,在我们看来,社会建设还包括什么?包括建设公民社会。所以我们说社会建设,首先是建民生;其次是建社会,你社会建设不建设社会建什么。所以要发展社会组织,发展NGO,发展自治组织,不然你政府职能转变不出去。人民群众多样化的需求,你没办法满足;第三是优化社会结构。我们说有阶层不可怕,可怕的是阶层固化,不能流动。所以优化、壮大中产阶级,培养、培育橄榄型的社会结构靠什么,靠畅通的流通渠道,让底层社会看到希望;四是加强城乡社区建设;五是要建设社会规范。应该讲社会建设主要是包括这五个方面的内容。

社会管理是什么?社会管理是社会建设

管理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建设哪有管理。就像这个企业管理,没有企业,到哪里去管理?社会建设在先,管理在后,没有建设哪有管理?是这个关系,社会建设是管理的基础,反过来讲,社会管理是社会建设的必然要求,要保障,没有管理无所谓建设,没有制度怎么建设。所以,我认为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是两件事情,是独立,相互联系的两个。但是后来有一个学者,一个非常有名的专家问我,说:按道理讲社会建设是基础,非常重要,为什么中央明确,着力在研究社会管理,不去研究社会建设。后来我一想,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实际上,我理解,因为社会矛盾特别多,我们要着力,要阶段性的应对社会矛盾最突出的强调社会管理。但是我要更放大点讲,我说:确实要从长治久安来讲,应该把社会管理放在建设当中去。所以我去年提出来说:社会建设包括什么?社会管理。所以如果说再进一步讲,打个不恰当的比喻,说社会管理相当于治病救人,社会建设相当于搞公共卫生、搞体育锻炼、搞群众体育运动,两者都是为了保持人的健康,但是它确实侧重点不一样。所以我想应该把社会管理纳入到建设当中去。以社会建设来推进社会管理。这是我讲的第一个观点。

第二个观点。是怎么样加强社会管理,我说再坚定推进社会管理,还讲前面社会管理与社会建设的关系,我最近提出了10个统筹。第一个统筹多元化主导;第二统筹条条块块;第三统筹社区的单位;第四统筹体制和方法;那这四个统筹都是讲什么?都是讲社会管理的体制问题。第五社会管理和服务;第六维权和维稳,现在维稳,首先是要维权;第七是德治和法治,从根本上来讲,从长远上讲,应该建立法制国家,依法执政;第八是民生和民主;第九是经济和社会;第十是城乡和居民。

逐步展开说,这十个统筹,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分析,前四个是讲社会管理本身,社会管理的主体,后四个有交叉,是讲管理的方法,那么,这七个还是讲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问题,就是我刚才讲的第三条,以社会建设推进社会管理。那么今年年初,周永康同志在2月7日社会管理创新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他也讲了几个问题,后来我注意到,中央政法委现在思路非常开阔,今年要在全中国13个省市县搞试点,除了4个直辖市以外,还有9个地方包括宁波、深圳、贵阳、南通、河北肃宁、山东的诸城、郑州的新郑等9个县市区搞社会管理,那么就提出了要统筹城乡、统筹经济和社会、统筹当前长远的关系。后来我在这基础上想了想,应该从社会管理、社会建设这个框架跳出来,应该把社会建设、社会管理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大的格局里面,来寻求社会管理的根本之路,因为我们注意到就社会建设,就社会管理本身来讲,很难找到出路,你说靠社会管理的积极,靠社会建设的这几个,管理就这么办了。因为总书记讲了,社会管理事关巩固党的地位,事关党的长治久安,事关人民安居乐业安康,所以这个非常大的涉及全局的事情,所以我认为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个全党的、全社会的事情。因此,它真是需要党委抓的机构,可能不一定是在政法委来统领这件事情,真切需要在体制机制上做深入的研究,所以有的同志也说,过去30年中国的改革,重点实际上是在经济上,

搞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那么今后若干年我们改革创新,应该从经济转到社会政治问题,原来人民日报一个副总编,后来当了上海解放日报总编,最近写了一系列文章。他讲中国的经济改革、社会改革和体制改革,那么我是比较认同的,我认为现在应该把社会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做大一点。把政治体制要做的事情放到这个框子里面来做,减小改革的阻力,减小改革的敏感性,为下一步政治体制改革铺平道路,奠定基础。大家知道,搞社会管理体制也是一种策略,也是一种战略,也是一种很好的路径选择。但是说社会管理根本解决,需要政治上有所作为。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实际上要做三件事情,第一,制约公民权利,最大的矛盾是干群矛盾;第二,最大的风险是什么,干群不和谐,第二最大的矛盾是什么,是劳资矛盾,是富人和穷人,是老板和员工,社会管理的核心建设就是这些;第三点,做为党政干部,我们党的优良作风是什么?是搞群众工作,群众工作就是现在的社会管理,社会管理就是我们党的传统的工作方法,这是两个问题,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并不矛盾,所以去年习近平同志,包括总书记讲,要用群众工作来统揽社会管理。所以我说搞社会管理,对领导干部来讲,首先是要正确群众观,对群众有感情,否则,再多的方法、再好的体制也无济于事。